

川陕苏区时期的儿童团与儿童政治动员研究

刘长江¹ 刘欣琛²

(1. 四川文理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政法学院, 四川 达州 635000;

2.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 文化艺术系, 四川 眉山 620010)

摘要:川陕苏区时期的儿童团是由8~15岁、贫苦家庭出身的儿童所组成,分设省、县儿童局、区大队部、乡中队部、村分队以及城市大队部的一个群众组织。对于儿童团,中国共产党在提高儿童文化水平基础上,让他们接受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并将之动员起来执行站岗放哨、巡逻以及配合红军作战等任务。这使儿童们既为保卫苏区发挥了作用,又对革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有利于他们更好地参与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后备力量。

关键词:川陕苏区;儿童团;儿童;政治动员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1)01-0086-09

doi:10.19742/j.cnki.50-1164/C.210109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入川,建立了川陕苏区。在此期间,中共成功开展了反田颂尧三路围攻、仪南战役、营渠战役、宣达战役以及反刘湘六路围攻和嘉陵江战役。在川陕苏区最盛时期,面积多达四万二千多平方公里,人口达七百余万,共建立了二十三县一市的苏维埃政权^{[1]21}。毛泽东在1934年1月指出,“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2]97}。中共之所以取得如此成绩,原因之一在于其对苏区群众进行了充分的政治动员,儿童也是动员对象之一。

目前学界有关川陕苏区儿童团的研究^[3],主要是简述了其组织、工作任务、性质、作用和特点等基本情况,并提及了中共对儿童的动员工作等。但这些成果对儿童团的分析较简单,只见骨架不见血肉,更谈不上具体深入的研究。诚如李金铮所言:“传统革命史著述更多表现了上层权力和英雄人物,而忽略了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主体性。”^{[4]161}之所以如此,笔者认为主要是由于川陕苏区基层史料的缺乏。近年来,随着大量民间史料被研究者挖掘出来,把眼光集中在普通革命者身上成为可能。本文主要利用口述和回忆录资料^[5],拟在重建川陕苏区时期儿童团史实基础上,探讨中共通过该组织动员儿童在保卫川陕苏区中的重要作用。

收稿日期:2020-05-19

作者简介:刘长江(1965—),男,四川渠县人,四川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政法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川陕革命老区历史与现实问题研究。

刘欣琛(1990—),男,四川眉山人,眉山职业技术学院文化艺术系,助教。

基金项目: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川陕苏区未刊历史文献资料收集整理与研究”(16XDJ003)。

一、儿童团的组织形态

1924年6月1日,中共组织起第一个儿童组织——以“劳动童子军”名称出现的安源儿童团^{[6]6}。1926年7月,共青团第三次扩大会议通过《儿童运动决议案》后,“儿童运动曾盛极一时”,全国童子团员多达12万左右^{[7]27}。1927年4月国民大革命失败,儿童运动受到打击,但仍有部分童子团在坚持斗争。随着各个苏区的开辟,儿童运动在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得到恢复发展,到1930年11月,“苏区劳动童子团总人数达70万人”^{[8]32}。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开辟川陕苏区,建立儿童团,将儿童运动带入川陕地区。

共青团中央规定儿童团的年龄为“十四岁以下(青年团的最低年龄为十四岁)”^{[9]472}。而川陕苏区儿童团成员年龄主要在8至15岁间^{[1]380}。儿童团的名称最初为“劳动童子团”或“儿童团”^{[10]164}。1930年12月,共青团中央根据少共国际执委决议与国际儿童局指示,规定“在苏维埃区域可以统一名称为‘共产儿童团’”^{[9]472}。“共产主义儿童运动是在团的直接领导之下的(不经过团组的),各级团部的儿童局,就是儿童运动的各级组织”^{[9]472}。川陕苏区儿童团在省一级有川陕省儿童局,“设书记、组织部及宣传部各一人”,以及数量不等的常委和执委;县一级有县儿童局;区一级有大队部,设大队长一人^[11];乡一级有中队部,设中队长一人;村一级有分队,其下又有小队,每小队有十至十五人。

儿童团成员是“广大的无产儿童”^{[9]473}。在笔者所见的史料中,川陕苏区一些儿童团成员的家庭条件符合该要求。如鲜澜山、胡文仲、祝自武和蔡永兴自称为长工,王奉文自称为雇农^[12]。此外,王大用自称:“我们王家祖上就住在这青龙寨山上,务农种庄稼,穷苦艰难,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小时候父母亲种了十多背田地,成天忙活路,还不够吃,经常是拿红苕、洋芋、南瓜、萝卜填肚子。住两间茅草屋,穿的巾巾吊吊(破烂),遮不住羞耻。”^{[13]273}根据《怎样分配土地》中“自己有少数土地,卖短工,做小贩,或佃种人家的田地耕种,受人家的剥削与压迫,一年收入不够穿吃用,这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叫做贫农”^{[14]762},可知其应为贫农。即使回忆有误,但也至少说明川陕苏区儿童团招收成员较看重贫苦家庭的出身。

二、中共发展儿童教育

红四方面军入川前,川陕边区的文化教育事业非常落后,川北地区只有个别县城设有国立中学,且规模小,招生人数极少。与城市相比,农村学校更少,“约1000人中有一所可容纳20人左右的小学”^{[15]8}。中共开辟川陕苏区后,制定了不少政策法规以推动苏区教育发展。1933年8月颁布《目前形势与川陕省苏维埃的任务》等文件,对如何推行苏区军民普遍教育和识字运动提出具体目标和设想^{[16]134-136};1933年9月颁布《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对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及县、区、乡、村级苏维埃文化机构具体工作提出要求^{[17]149}。《贫农团、雇工会、少年先锋队、儿童团组织法》则直接针对儿童团教育,要求“实行对工农儿童的共产主义教育,要反对资产阶级及一切反动的麻醉儿童的教育”“在政治上、文化上加紧工农儿童的教育与训练”^{[18]407}。《中共川陕省委关于红五月工作的决议案》中提到,“童子团要在红五月内至少每人认一百字,要送到每个岗棚,每人能看路票”^{[19]53},因为只有能识字才能识别路票,避免被欺骗^[20],方法是“识字读报”等。1934年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川陕省委关于少先队、童子团的决议》提到,“童子团的文化教育少得很,有许多县还没有一个学校,再以一般小同志站岗还不很高,同时对政治认识一直没有。”^{[21]366}这段反思也侧面反映出党团对提升儿童团文化

水平的重视,解决的方法是“团要负责多办列宁小学、识字班、读报班种种文化工作”^{[21]366}。在这一系列政策的推动下,中共设立了列宁学校、贫民学校、工农中学和“中学及专科学校”^{[1]520}等各类学校及各级文教管理机构:省设川陕省委文化教育委员会,其下有学校教育局、社会文化局和国家出版局;县设文化教育委员会;区设文教委员;乡、村由苏维埃委员分管。对于不能脱产学习的工农群众和部分不能进学校的青少年,中共则对他们开展识字教育^[22],同时设置俱乐部、阅报室供其利用^{[1]511-524}。

三、中共对儿童的政治动员

政治动员“主要用于描述政治权威对公众行为的某种诱导或操纵。之所以实施这种诱导或操纵,通常是为了达到某一特定的政治目标”^{[23]293}。川陕苏区时期中共的政治动员方式主要有组织控制、宣传鼓动、利益刺激、革命运动和社会教育^[24]。其中对儿童的政治动员方式主要是:在提高儿童文化水平基础上,通过儿童团对其进行政治教育,并辅之以军事训练。

儿童团的政治教育形式以唱歌和文化学习为主,内容主要是揭露四川军阀的残暴与穷人的苦难,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目标和土地政策。据陈友茂回忆,他们在儿童团里经常唱一首歌。该歌曲歌词先描述红军入川前穷人的悲惨生活,“夜晚无被盖呀,冬天无棉衣啊,一身穿的个烂巾巾,冷得跳起希希呀(乱跳),唉嗨哟冷得跳希希呀。家中无有钱啊,出门也艰难呐,身上莫得一点力,走路立不起,唉嗨哟走路立不起。”随后,又揭露军阀对穷人的凶残,“往年拉壮丁啊,光拉穷人们啦,日夜躺在那个大山林,活路做不起,唉嗨哟活路做不起。”最后,点出红军使穷人翻身,前途光明,“来了红呀军哦,穷人翻了身啊,前途也光明啦,唉嗨哟前途也光明”^{[25]144}。歌词通过对比军阀和红军的行为,表明军阀是穷人的敌人,红军是穷人的救星。儿童们在歌唱中感受到红军的伟大。除此之外,有时在开会时还会“教唱《帝国主义要推翻》等红军歌曲”^{[26]286}。吴平安回忆,“那时候的革命歌谣,大家唱我也跟着唱,天天都在唱,到处都在唱”。这样的环境有利于革命观念深入儿童心中,以致于“有一些歌我现在还记得”。儿童在唱歌中认识到革命的目标是“帝国主义我们要推翻,建立了苏维埃,穷人不受难”;认识到红军的平等友爱和军阀长官的残暴,“军阀兵受欺压,军阀长官要打人。我们红军官兵都平等,吃穿都一样,绝不打骂人”;了解到革命手段是“打土豪、分田地”^{[27]232}。

儿童团成员们利用站岗空闲和睡觉前夕学习文化知识。王崇华回忆,“我们站岗放哨也好耍了,那些地方又没得川军,就在哨棚里学习”^{[28]506}。鲜澜山回忆,“每晚睡觉时,都在背诵学习‘打土豪、分田地’‘穷人要翻身、人与人要平等’‘红军必胜、共产党万岁’等等”^{[29]8}。吴平安回忆,“除了站岗、放哨、送信之外,一有空还学文化”。当看到课本上讲穷人“又冷又饿住茅屋。吃没吃顿好饭菜,穿没穿件好衣服。一年四季做活路,牛马畜牲都不如。忙来忙去忙个死,算起账来百事无。缺柴少米又无盐,一家大小泪涟涟。不死只有去借债,一本借来对本还”时,产生共鸣“同我家当初的情况一样”^{[27]232}。如前所述,儿童们的家庭经济状况都不好,这些诉说穷人苦难的内容可能会引起他们的共鸣,从而有助于其认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念。此外,儿童们由于家庭贫穷念不起书,故对于中共提供的文化教育十分珍惜,如鲜澜山回忆,当时“一听说给时间让我们学文化,劲头足得不得了”^{[29]8}。这也有利于儿童们主动接受政治教育。

中共派教员教导儿童文化知识。如谢才山回忆,每天晚上“学文化学认字,宣传队的教员教我们一句,我们跟着念一句”^{[30]180}。王大用回忆,教官“他天天给我们讲革命道理,说童子团是红军的队伍,红军专为穷人打天下,闹翻身”,又经常教他们“歌句子”。歌句子指出穷人们辛勤劳动却生活艰难,“庄稼汉,脚跑翻,莫饭吃,莫衣穿。发财人,多逍遥,肩不挑,背不磨,吃鸡汤,穿绸缎”,进而说明穷人要想打

破这一切就应“当红军,打土豪,分田地,斗劣绅,分浮财”,以激发穷苦家庭出身的儿童们参与斗争的积极性。教官还写诗向儿童们宣传革命,“自愿报名当红军,打倒土豪闹翻身,穷人当家作主人,冲破黑暗享太平”^{[13]274}。口语化的语言有助于儿童们理解。中共选择儿童团教员时会考虑到年龄因素。如李元兴回忆,红军工作队“派了一个十六七岁的红军战士(湖北人)专门帮助我们童子团工作”,这位教员的年龄和经历与儿童成员们相仿,容易与之亲近,所以“我们非常喜欢和羡慕这位少年红军,他待我们也特别亲”。正因如此,儿童们便愿意接受他的教导,“使我们更加了解红军,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向往着参加红军”^{[31]24}。此外,区苏维埃首长也会培训儿童团,如区苏维埃主席黄政红“经常给我们上课”,讲解童子团性质、学习方法和红军纪律等^{[26]286}。

开会也是儿童团成员们接受政治教育的一种方式。据王大用回忆,1933年6、7月间,他和一百多名儿童团成员参加长赤县苏维埃大会。会上有三位“不晓得姓啥子”的首长轮流讲话,“主要讲的与红军有关的内容”“听得似懂非懂的,忽而言之,觉得很新鲜”。台上还有一人“好像念的是《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随后是李先念讲话,“听不大懂”。讲完之后,李先念带头高呼“苏维埃万岁”“红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下面群情激奋,跟到呼喊,把会议情绪推到了高潮。这次会议,对我触动很大,使我终生难忘”^{[13]275}。首长讲话和《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的受众主要是成人,其内容对儿童而言较难理解,以致王大用听得一知半解、印象不深,实际教育成效可能不大,但会场上群情激昂的情景则使之直观感受到革命气势的热情高涨。另外,县保卫局代表常抓来一些土豪劣绅、地主恶霸开斗争会,“童子团也学着参加斗争”^{[26]286},这种亲身体验有助于儿童们认识中共革命的对象和方式。

四、中共对儿童的军事训练

其时,针对儿童团进行军事训练的内容主要包括学习站岗放哨、下操、列队、投弹、射击、劈刺等。

1934年6月,川陕省委专门为儿童团印发了《童子团站岗读本》^{[32]1083-1084},以帮助其提高站岗放哨能力。该读本五字为一句,两句表达一个意思,读起来有节奏感,琅琅上口,便于儿童记忆、运用。如鲜澜山回忆,“我背得滚瓜烂熟,并遵循读本的要求,严格检查来往行人”^{[29]8}。此外,共青团川陕省委宣传部还印制了《童子团、少先队、站岗问答》。《问答》以一问一答的形式,讲明了站岗放哨的意义和查路票、盘问、观察、检查行人的方法及处理可疑人物措施,强调特别要注意“白区来的人,讨口的和做小生意的,说话口音不对的”,要求“不管他是红军拖枪的或骑马的,不管他是亲戚朋友,凡是没有路票的都不放他过去”。《问答》并没有复杂地阐述该如何识破敌人的伪装,而是只强调认路票,这符合儿童们的认知水平。此外,《问答》还阐述了站岗纪律、分班、岗哨设置地点及童子团与赤卫军和少先队的分工等^{[33]1200-1201}。

唱歌形式的教育比较适合儿童天性,使之更易理解站岗放哨的意义。如《童子团站岗放哨歌》:“我们童子团,放哨定要严。穷人分田地,富人心不甘。派些反动派,进来当侦探。企图探消息,破坏我政权。时时要注意,站岗要加严。”^{[34]161}歌词在内容上指出了站岗放哨的意义,提醒儿童们站岗要严;在形式上简明顺口,有利于儿童理解记忆。另一首《站岗歌》:“各地成立岗哨,盘查过往行人。一要看他印章,二要分他情形。有票才能走路,无票不准通行。”^{[35]1843}逻辑清晰,内容简单,易于儿童理解。

除了学习站岗放哨,在列宁小学的“男孩子童子团”每天上午上课,下午“下操……站岗放哨”。部分学校还有红军教授军事,内容包括刺枪、劈刺、瞄准、扔手榴弹,练习紧急集合等^{[1]515}。儿童团还以区、乡为单位开展集中训练^{[36]394}。团员们每天“很早起来出操”^{[29]8},“天天在场边上的风干坝(今巴中南江县杨坝镇供销社处)训练,用的是木枪、木刀,还学下操”^{[26]286},一些儿童团还要练习“投弹、打靶和打野

操(下操)等”“区上每次训练儿童团时,县儿童局要派人指导”^{[36]394}。据老红军周国平回忆,儿童团用木头枪和木头手榴弹进行军事训练,科目包括列队、正步走、前后左右转、射击和投弹等,“大家练得非常起劲”^{[37]405}。

儿童团的军事训练主要是利用川陕苏区军事斗争的间隙进行的。据虎易林回忆,1934年4月左右,为反击国民党反动军阀对川陕苏区的六路围攻,红军主力都调去前线作战,“儿童团的训练也没有以前紧张规范,后来就停顿了一段时间”。战役胜利后,儿童团在岳连长的带领下,“又恢复了学习训练,方式和内容跟以前差不多,没有多大变化”^{[26]287}。就此而言,在川陕苏区时期,战争持续不断,儿童团的军事训练很可能缺乏连续性,影响训练效果。

五、儿童团政治动员效果

通过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儿童团成员积极参与站岗放哨和巡逻,并配合红军作战,以及帮忙送信、慰劳军属等。其中站岗放哨、巡逻、配合红军作战对于保卫苏区有着重要作用。

(一) 站岗放哨与巡逻

残酷的军事斗争要求党团采取措施以防敌人破坏苏区,儿童团站岗放哨便是其中之一。1933年4月,《中共川陕省委关于红五月工作的决议案》中提出,要“加紧……童子团军事政治训练、站岗、放哨”“动员少先队、童子团……加紧戒严、站岗、放哨、捉敌人侦探”^{[19]52}。1933年12月,《共青团川陕省委关于赤北、红江团的工作检查决议案》中批评“童子团简直没有站岗放哨,有少数市镇口上有站岗的,还是不严密”^{[38]177};《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川陕省委关于少先队、童子团的决议》指出,“团对少先队、童子团的经常教育不够,军事政治教怎样去站岗放哨,一般小同志都不知道”^{[21]365}。这些批评从侧面反映出团省委对儿童团站岗放哨的重视。

儿童们按照《童子团站岗读本》要求执行站岗放哨任务。如《读本》要求“好好看印章,恐防有假造”,一些儿童团成员对此做得较好。据鲜澜山回忆,他在郑家山和县苏维埃儿童团团长江国琼一起放哨时,发现一男一女的路条上“印章模糊不清”,立刻“引起我们的怀疑”。在两名农民帮助下,两名儿童团成员将其抓获并押至乡苏维埃,从女人发卷中搜出记有“当地红军指战员的数量、驻地以及苏维埃政府的有关情况”的情报^{[29]9}。

《读本》要求“不管负责人,不管是红军。一定要有票,才得许他行”,儿童团严格执行。如杨茂德在石门子站岗时,向骑着马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索要路票。徐向前为了考验他们,故意不拿出路票,团员们便“拉住他的马,坚决不准他通过,说了半天都没有放行”^{[39]382}。骑马体现出过路者的地位在军中可能较高,并且他还“说了半天”,但儿童团成员对此并不在意,充分体现出其警惕性。杨木金回忆,他在1934年初冬的某天下午,与二福等人拦下了为了考验他们而故意不拿出路票的徐向前,之后,“徐总指挥考哨兵的故事,象长了翅膀传遍了整个川陕苏区”,而他们也受到了奖赏^{[40]55}。即便是自己的亲人,儿童团成员们也要求其出示路票。程红兴回忆,1934年1月某天,他同房的二娘带着她弟弟回娘家,“她认为是自己侄娃儿站岗,满有把握通过隘口,用不着绕道到村子里扯路条”,结果被拦下,气得她向程红兴的奶奶告状,“火娃子六亲不认,太缺德了!”^{[41]74}由上述可知,中共通过政治教育已将敌我意识融入儿童们心中,逐渐打破了传统的乡村伦理。

儿童团成员还要经得起钱财诱惑,即《读本》中提到的“莫贪他东西,莫贪他金钱”。伏文行站岗时遇见团长化妆检查,“不是给我们取个钱,就是给我们取个衣服来哄”,而成员们警惕性高,“没说的,就把他绑了”。这体现出儿童团成员意志力较强,能抵制住物质诱惑。随行的团长警卫员“告诉我们他是

团长的时候”，他们都还不信，直至“把路票拿出来”才放了人，儿童团成员因此受到团长嘉奖^{[42]453}。

站岗放哨不仅要查过路人，也需注意可疑情况。1934年春天，孙洪如在草池坝站岗时，发现下街里有一户人家卖甜糕“每晚都卖到天亮”。他感到有问题，“半夜三更为什么还有人吃甜糕呢？”于是向苏维埃政府报告了这件事。后来儿童团从那户人家中搜出四个钢盔、四件雨衣、三把大刀并将这些物品送至苏维埃政府，受到表扬^{[36]395}。

与站岗放哨相关的工作是巡逻。1933年2月，方桂英和敖玉华在巴城南门桥巡逻时，发现有两个人“慌慌张张地往城里跑”，他们立刻拿起矛子盘问其身份和进城目的。两人自称是穷苦农民，为逃避国民党拉壮丁才逃出来，准备向城里的红军报告敌情。两人的回答合情合理，但方桂英和敖玉华“对他们身份还有怀疑”，直到八大王沟村苏维埃张主席过来拿出路条，并证明两人所言属实后，才将他们带到许世友团部汇报敌情^{[43]34}。由此可见儿童团成员的高度警惕性。

（二）配合红军作战

虽说战场上的主要作战力量是红军，但儿童们也能凭借自己的某些儿童特点起辅助作用。赵明才回忆，在一次剿匪战斗中，为了逼迫藏在山洞里的土匪出来，红军决定烧辣子面。此时，随军参战的儿童团成员们发挥了作用，“我们儿童团员小，身材敏捷，我更是跑得快，砍柴、点火，找辣子面，跑得飞快”，在离洞不远处点燃干柴并撒上辣子面，熏得敌人“在山洞里跑转转（打圈圈）”，被迫投降^{[44]488}。

1933年10月，刘存厚军溃败后从宣汉向南坝逃跑。儿童团长余德寿和修成清以上街抓药为名侦察敌情，发现敌军十三团某连夜宿三河场，“第二天必经马立爪到南坝”的情况后，立即将敌情报告给王维舟。次日，川东游击军便根据情报成功全歼敌军，“缴枪八十支”。1933年12月上旬，驻扎在石骨寨的红三十军某团奉命撤退至达县北山场，君塘乡儿童团负责掩护。天黑后，每个儿童团成员将自家养的牛牵到石骨寨，“在每一头牛的尾巴上捆上火炮”。当赵东娃团长喊放时，成员们就一起点燃火炮，使牛受惊后“满山乱跑”，“这样反复数次，敌人误以为是红军在严密防守，就龟缩在工事里不敢轻举妄动了”。直到次日，敌军才发现“上了一群儿童团员们的当”^{[45]395}。

在反六路围攻的九子坡战斗期间，王崇华和毛牛子向前线送草鞋，途中发现有几个川军趴在草丛里。川军士兵以金钱诱惑二人带路去麻石，两人假装同意，带着他们“穿老林，钻刺笼，过沟沟，爬坎坎”，使之劳累不堪，最后将他们带到了红军阵地上^{[28]50}。川军士兵之所以被诱至红军阵地，或许也是因为看到两人是儿童而放松了警惕。

上述老红军在回忆时，对于儿童团的作用或有所夸大，但也反映出儿童们可凭借其独特优势在战场上协助红军作战。

六、结语

在川陕苏区，中共为了巩固和发展政权，建立了工会、贫农会、共青团、少先队、儿童团、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反帝拥苏大同盟等群众组织。其中，中共通过儿童团将8~15岁、以贫苦农民家庭出身为主的儿童组织起来，对他们进行政治动员，使之参与到保卫苏区的行动中。

中共首先发展苏区的教育，提高儿童们的文化水平。在此基础上，中共在儿童团中一方面以唱歌、上课、开会等形式开展政治教育，使儿童们认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念、手段以及革命对象；另一方面则通过军事教育训练儿童们的军事技能，配合政治动员。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儿童们积极执行站岗放哨、配合红军作战等任务，为保卫苏区发挥了一定作用。此外，儿童们对于中共动员群众也发挥着一定作用。如李元兴回忆，在红军、区乡苏维埃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围剿寨坝河团总朱天福时，儿童团员

们“掩护、组织当地穷人到朱匪家里分粮食财物”；带头报名参加红军后，“紧接着，又有许多人争着报名”^{[31]26}。

此外，儿童团的儿童们在执行这些任务的过程中也得到充分锻炼，有利于他们更好地投入革命。如方桂英后来成为红四方面军新剧团演员，从事革命宣传工作；王全禄成为了通信兵；周德华被编入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三团；何永才转到了少先队；董太玉随军长征到了延安。儿童团为中共提供了革命的后备力量，为其夺取革命的胜利发挥了作用。

〔参 考 文 献〕

- [1] 林超.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 [2] 毛泽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一九三四年一月)[J]. 江西社会科学,1981(12).
- [3] 代表性成果有:王明渊,张一军主编. 川陕苏区童子团[M]. 成都: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1989;林超主编.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刘长江. 浅析川陕苏区团组织与苏维埃政权的巩固[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15(3);马建堂. 论川陕苏区时期的群众组织[J]. 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5(3);周治君. 川陕苏区的民众动员[D]. 硕士学位论文,电子科技大学,2017;陈月亮.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政治动员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西华师范大学,2018;王华. 川陕革命根据地社会动员工作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8;等。
- [4] 李金铮. “新革命史”:由来、理念及实践[J]. 江海学刊,2018(2).
- [5] 定宜庄,汪润主编. 口述史读本[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 [6] 黄洋. 中国最早的红色儿童团——安源儿童团研究[J]. 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2).
- [7] 吴媛媛. 红星照耀童年——1927—1949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儿童运动研究[D]. 博士论文,南京师范大学,2014.
- [8] 魏兆鹏. 从劳动童子团向共产儿童团的转变[J].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2(3).
- [9] 儿童运动决议(草案)——根据少共国际执委决议与国际儿童局来信改造儿童运动(1930年12月11日)[G]//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 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 1960.
- [10]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三次扩大会议关于儿童运动决议案(一九二六年七月)[M]//中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 中国妇女运动文献资料汇编(第1册 1918—1949),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49.
- [11] 鲜澜山. 我报名参加了儿童团[Z]//李树海主编. 红色讲述——川陕革命根据地巴中老红军口述史. 内部资料.
- [12] 鲜澜山. 他和吴瑞林第一个打出红旗迎红军[Z]. 胡文仲. 我家分得了三亩好田地[Z]. 蔡永兴. 我为红军鏖字队看哨[Z]. 王奉文. 我受到了熊主席的表扬[Z]//具体参见李树海主编. 红色讲述——川陕革命根据地巴中老红军口述史. 内部资料.
- [13] 王大用. 在长赤聆听李先念讲话[Z]//李树海. 红色讲述——川陕革命根据地巴中老红军口述史. 内部资料.
- [14] 1933年2月2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印. 怎样分配土地?[M]//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
- [15] 余文盛. 川陕革命根据地教育文献资料集编[Z]. 内部资料.
- [16] 目前形势与川陕省苏维埃的任务(川陕省第二次全省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M]//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
- [17] 1933年9月16号红三十军政治部翻. 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M]//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
- [18] 贫农团、雇工会、少年先锋队、儿童团组织法[M]//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
- [19] 中共川陕省委关于红五月工作的决议案(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三日)[M]//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

根据地博物馆.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2.

[20] 程红兴. 八岁的儿童团员当标兵[M]//川陕苏区童子团. 成都: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1989, 第73页。

[21]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川陕省委关于少先队、童子团的决议[M]//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2.

[22] 雷光辉. 识字岗[M]//川陕苏区童子团. 成都: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1989 年版, 第61页。

[23] 高松寅. 政治哲学关键词[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4.

[24] 陈月亮.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政治动员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硕士论文, 西华师范大学, 2018.

[25] 陈友茂. 儿童团白天晚上轮流看守苏维埃[Z]//李树海. 红色讲述——川陕革命根据地巴中老红军口述史. 内部资料.

[26] 虎易林. 我们全家都投入到了苏区工作[Z]//李树海. 红色讲述——川陕革命根据地巴中老红军口述史. 内部资料.

[27] 吴平安. 在渔溪通往雪山的大路上站岗放哨[Z]//李树海. 红色讲述——川陕革命根据地巴中老红军口述史. 内部资料.

[28] 王崇华. 母亲把我送到得胜场[Z]//李树海. 红色讲述——川陕革命根据地巴中老红军口述史. 内部资料.

[29] 鲜澜山. 他和吴瑞林第一个打出红旗迎红军[Z]//李树海. 红色讲述——川陕革命根据地巴中老红军口述史. 内部资料.

[30] 谢才山. 我们在七颗星站岗放哨[Z]//李树海. 红色讲述——川陕革命根据地巴中老红军口述史. 内部资料.

[31] 李元兴. 革命征途的起点, 王明渊, 张一军. 川陕苏区童子团[M]. 成都: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1989.

[32] 1934年6月5日少共川陕省委宣传部出版. 童子团站岗读本[M]//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2.

[33] 中国共产青年团川陕省委宣传部印. 童子团、少年队、站岗问答[M]//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2.

[34] 龚仲礼. 我最爱唱红军歌曲[Z]//李树海. 红色讲述——川陕革命根据地巴中老红军口述史. 内部资料.

[35] 站岗歌[M]//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2.

[36] 孙洪如. 我在红江县草池坝儿童团当队长[Z]//李树海. 红色讲述——川陕革命根据地巴中老红军口述史. 内部资料.

[37] 周国平. 红军给我发了一支单子枪[Z]//李树海. 红色讲述——川陕革命根据地巴中老红军口述史. 内部资料.

[38] 1933年12月4日共青团川陕省委关于赤北、红江团的工作检查决议案[M]//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2.

[39] 杨茂德. 那时苏维埃经常在毛浴开群众大会[Z]//李树海. 红色讲述——川陕革命根据地巴中老红军口述史. 内部资料.

[40] 杨木金. 模范童子团二三事[M]//王明渊, 张一军. 川陕苏区童子团. 成都: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1989.

[41] 程红兴. 八岁的儿童团员当标兵[M]//王明渊, 张一军. 川陕苏区童子团. 成都: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1989.

[42] 伏行文. 在二郎庙我们逗了团长的硬[Z]//李树海. 红色讲述——川陕革命根据地巴中老红军口述史. 内部资料.

[43] 方桂英. 我是红军新剧团的女演员[Z]//李树海. 红色讲述——川陕革命根据地巴中老红军口述史. 内部资料.

[44] 赵明才. 我们儿童团再怕也要站出来[Z]//李树海. 红色讲述——川陕革命根据地巴中老红军口述史. 内部资料.

[45] 廖乐山, 余洪贵, 余宗相, 吴平, 刘渝东. 土地革命时期宣汉县党、政建设及活动概况(1928年8月——1935年3月), 宣汉党史资料汇编[Z]. 内部资料.

Children Team and Mobilization for Children in the Period of Sichuan-Shaanxi Soviet

Liu Changjiang¹ Liu Xincheng²

(1. School of Marxism-Politics, Sichu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Dazhou Sichuan 635000;

2. Department of Culture–Art, Meisha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Meishan Sichuan 620010, China)

Abstract: The Children Team in the period of Sichuan–Shaanxi Soviet was composed of poor children aging from 8 to 15, which had its organization in province, county, town, village and city. Under the guidance of CPC(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children were educated to get universal knowledge, to accept political idea and military training. They were mobilized to stand sentry duty, to go on patrol and to aid Red Army for battle. The Children Team ha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tection of Soviet area and had knew more about revolution, which helped them to actively anticipate in revolution and to become the reserve force for the victory of revolution led by CPC.

Keywords: Sichuan–Shaanxi Soviet; Children Team; children; political mobilization

[责任编辑:刘 力]